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沿阵地

——兼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

■ 王 丽

(上海理工大学 中国 上海 200093)

【摘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具有指导性意义。回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流变、地位和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有助于我们清醒把握其主导地位,更有针对性地面对科研教学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与此同时,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党史、史学理论等相关学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值得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5]01-0020-03

10.13553/j.cnki.lygg.2015.01.005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具有指导性意义。该学科建设的目的和宗旨,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基本规律、主要经验的研究;同时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①新兴学科引起相关部门、专家、教师的重视。在相关讨论中,首要澄清该学科的必要性、学科功能和性质;其次探讨学科建设如何开展;再次研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具体问题。^②

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笔者完整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特别是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合的历史过程。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学科建设实情,尝试回答如下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确立、传播及其曲折的中国化进程,为当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带来何种启示?同时,指出在当今现实情况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加强自身建设、与外界对话、接受考验的前沿阵地。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与中国史学的结合

史学交流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应该放在近代中西史学交流的脉络中解读。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直接接触;20世纪,中国史学与外来史学的紧密联系成为该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特征。具体而言,自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始,中国史学开始由朴素的历史观转向进

化论,再到李大钊以来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与同一时期将“兰克史学”大力推广、倡导“史料即史学”的史料学派,^③甚至包括将杜威的“实证主义”引入中国,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中国史学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变动时期。^④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烈的政治演进和社会动荡之中,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前途出路理论思考诸多模式中的一种。

诚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初期尚只是在中国流行的一个外来史学流派。不过它一经传入,便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注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名篇介绍和阐发了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把“致用”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宗旨,指出唯物史观对史学的意义。

真正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运用于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郭沫若。郭氏的史学成就主要在古史领域。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后,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结合。此作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端,他本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的地位亦由此奠定。此著一出,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大论战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也参加过上述论战,并因此登上学术舞台。吕振羽的代表作是1934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开了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的先河,

作者简介:王丽(1984-),女(汉),湖北长阳人,博士,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①该学科依据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通知《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设立。

^②代表性论文有沙健孙: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8);宋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属性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8);李松林、韦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

^③其代表人物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参见张广智:近2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J].史学史研究,1998,(4)。

打破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垄断地位。翦伯赞于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陶希圣、李季、胡适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侯外庐于1939年发表了《社会史导论》。^[2]上述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和范文澜,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3]但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鲜明的共性,即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来进行历史书写,且研究兴趣都集中在古代史。

抗战时期,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落户”延安,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4]1938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之一节》)。次年,苏联哲学家罗僧塔尔与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把斯大林所说的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引申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此说一出,在中国政界、学界迅速引起了积极回应。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总结,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1939年冬,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0年学术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展开争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宗旨一度被空前强化。应该指出,史学服务于现实,既有政治原因,也与当时抗日战争爆发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人们普遍追问史学意义,亦将史学作为一种救亡工具。

抗战时期,历史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研究两相结合,形成当时史学理论的基本范式。“五大家”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以研究成果论,该时期不乏“求真”的探索,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前两卷、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的大部分,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史社会史》,都是严格的学术著作。这些成绩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30年代在社会史和古代史领域所取得的地位。^[5]该时期成就最大的是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1945年,范氏著成《中国近代史》;三年之后,胡绳写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当时中国史学第一名著。同时,我们注意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危机和强调史学功能主义的强化,不仅向国人灌输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也传来了苏版史学理论。以论代史,史学政治化等打上了斯大林主义的苏版历史唯物主义烙印的史学观流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苏式治史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史学,五个阶段说已经成为一种“定律”而不容怀疑。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6](p172-180)《学习和时局》^[7](p190-201)等文中的提出的理论指导,抗战时期中共党史得以系统研究。如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党的“六大”的研究》以及《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作。以党史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延安,乃至重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时代特点。^[8]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发展,为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进一步加大了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清算,批判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五个阶段说被学界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律”。在“厚古薄今”、“古为今用”等导向下,学界就“历史”、“史学”和“现实”三者的关系、“史论关系”等问题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解放初期大陆史学界强调阶级斗争、主张唯物史观,两者并行不悖;但从1958年开始的“史学革命”起,到60年代初,出

现了“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的口号之争,“阶级斗争”逐步演变成唯物史观的核心。^[9]林甘泉、关锋、林聿时为代表的史学家和宁可、李文海等人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论战,后者的观点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史观”、“反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标签,翦伯赞的相关论点被扣上了“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帽子。直到1965年《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论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最终以政治大批判扼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思想。这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使那时业已存在于中国学界的公式化、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作风,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日益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格外彰显,使历史研究丧失其科学性与自身特点,而沉溺于一种僵化的模式中。以至于文革期间,“影射史学”、“阴谋史学”泛滥,史学失去了其尊严,遑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人们剥去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身上的神圣光环,在反思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基于对现存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模式的不满,八十年代兴起的“史学危机”论,首先批判了文革期间史学为政治所利用的情况。鉴于文革的历史教训,有史学家提出将历史学进行“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的区分。^[10]其次,学界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遗产的同时,对传统唯物史观进行反思,批判了传统唯物史观,特别是“唯物史观名义的阶级斗争史观”。传统史观认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包含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但从实质上看,极端片面的阶级斗争史观并不属于唯物史观。由于阶级斗争史观在文革的时候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所以人们也将之视为唯物史观中的一个理论派别。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观点,但不是唯物主义史观的核心。^[11]

新时期史学在反思中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就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而言,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入的阶段。有以下三个现象值得关注:(1)近代史的线索问题讨论,胡滨、戚其章提出“半殖民封建社会的两项基本任务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线索”;李时岳提出“四个阶梯说”,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理论,都在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特别是在“现代化”理论,成为历史学叙述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①(2)近代史上的很多问题,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等等若干重大问题都有专题性研究,产生了一大批成果;(3)近代史学科建设走向成熟和细化,包括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逐步成立。此外,史学理论逐渐成为一个学科,方兴未艾。1983年开始“史学理论热”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其社会形态说、文明历史说、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等问题都引起过热烈讨论,产生了“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说法。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进行自我反思和结束了多年与西方史学的隔绝状态之后,迸发新能量,显现新动向。首先,多样化西方社会思潮传入,让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得到一定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代异军突起。所谓“西马亦马”,即指承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脉络的传统本性。^[12]一批接受过良好史学训练、亲身经历过二战、有着强烈现实人文关怀的史学家如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

^①如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等通史类书籍均以现代化作为叙述线索。

“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取向,关注普通民众及其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80年代,出现了一个翻译海外史学著述的高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作品在中国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回应。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观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冲击。该思潮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最初是“五月风暴”之后在文艺领域内兴起,其后扩及社会人文学科等诸多领域。王晴佳教授就指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所谓“后学”思潮对当代西方世界史学研究的影响,不管人们愿否承认,已经有很明显的表现。20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最有名的代表是海登怀特、阿克斯密特,他们的思想对现代史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催生成果颇多。但因其无论在历史观和史学观上,都与传统史学的论见互不相容,虽然产生了很多“新论”,却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开放所带来的对话与冲击也使我们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主体意识形态时面临着新考验,如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兴趣淡薄、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争论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立,本身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重要措施;更有针对性地是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加强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来引导当代青年对历史的认识。继而又建立了与之相应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笔者认为,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流变及其现状而言,“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自身、接受挑战的前沿阵地。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

正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观是值得我们在经典学习中去认真了解的。同时,较为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与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清楚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在指导我们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走过的艰辛历程。同样,深刻体会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传统,有助于我们今天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中从源头明晰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指导性地位,及当今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应该秉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同时,了解马克思主义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特别是当下的现实状况,具有从学术和现实两个层面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双重意义。从学术上来说,在社会思潮、史学理论多元化的格局之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亦可以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营养。这正是笔者提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前沿阵地的重要出发点。

从现实的学科建设来看,马克思主义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告诉我们,“党史”学科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13]因为自党史诞生以

来,便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方面成绩最突出者,其史料运用、叙述范式,都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提供了标本。同时,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也可以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所用。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本来就是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上具有一定深度;同时让我们关注到其他史学理论的发展、流变,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时候保持开放的心态,建立全局观,进而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除此之外,如学界已经指出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可以资源共享、相互借鉴。

在现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诸多建言中,提倡最多的是对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颇需慎重。纵观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在理论、方法多元化的格局之下意识形态早已走向淡化,其成果能在若干史实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却无法从整体意义上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史观。所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两者因学科名称的类似而笼统看待,^①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本质的。这也正是我们在运用“中国近现代史”相关成果来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时所需谨慎之处。

参考文献:

- [1]张广智: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J].学术研究,2006,(4).
- [2]王昌沛、周文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以郭、范、翦、吕、侯为对象的研究[J].史学史研究,2009,(2).
- [3]张剑平:郭沫若古史分期学说的完善及引起的学术辩论[J].郭沫若学刊,2003,(3).
- [4]张书学: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转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 [5]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5,(3).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黄静: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J].学术研究,2013,(2).
- [9]蒋大椿:近五十年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 [10]杜蒸民:也谈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标准——与蒋大椿同志商榷[J].安徽史学,1986,(2).
- [11]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1,(4).
- [12]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J].史学理论研究,1996,(2).
- [13]张健:中共党史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定位与整合[J].历史教学,2013,(2).

责任编辑:李学军

^①有学者针对两者名称类似、易生误解的问题,提请将现有学科名称“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改为“近代中国研究”,李松林、韦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报告[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